

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

黄继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

黄继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黄继锋 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ISBN 7-80109-555-3

I. 东... II. 黄... III.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214 号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19 千字

印 张 5.625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 元

导 言

关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剧变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讨。然而有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即产生于这些国家内部的某些思潮是催动东欧剧变的思想理论先导。

在这当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一股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并对现实社会主义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思潮,其主要代表包括:前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这些流派及代表人物都曾活跃在各自国家的理论舞台上,并对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在 50 年代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曾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欧各国的极大震动,随之爆发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七月事件,更是给整个社会主义的声誉以极大损坏。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两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革势在必行,多数国家继南斯拉夫之后把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关于冲破旧体制和设计新体制的议论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对共

产党的领导作用滥施批评的言论逐渐抬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成长一起来的。它一方面试图为改革呐喊助威，另一方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就是后者在东欧的翻版。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严肃的理论性探讨，但其主旋律是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概观其理论观点，以下几个方面极具代表性：

第一，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应当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基础之上，应当是“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第二，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异化现象，反而自身成为产生新的异化现象的根源。在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仍然只是任人摆布的社会客体，而把握国家权利的官僚集团才是社会的惟一主体；第三，党已经异化为官僚阶层。鼓吹结束一党统治，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行中发生了质变。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从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而扩大到其他方面，成了官僚集团滥用来镇压无辜群众的工具，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的专政；第五，借口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否认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在今天深入反思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时，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所在。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南斯拉夫的“实践派”	1
第一节 “实践派”的兴衰	2
第二节 “实践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观点	11
第三节 实践观和异化观	18
第四节 社会主义观	27
第二章 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一)	3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经历	37
第二节 作为修正主义者的科拉科夫斯基	47
第三节 后修正主义时期的科拉科夫斯基	72
第三章 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二)	84
第一节 沙夫的认识论观点	85
第二节 沙夫的人道主义观	92
第三节 沙夫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	105

第四节	波兹南学派的“非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	120
第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马克思主义” ……	128
第一节	思想领域的“非斯大林化”过程 ……	129
第二节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	143
第五章	匈牙利、民主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	160
第一节	布达佩斯学派 ……	160
第二节	民主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	169

第一章 南斯拉夫的“实践派”

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才取得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共和国。

由于南斯拉夫人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因此他们不愿屈从于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的控制,他们不承认苏联在共产国际中的中心地位,不承认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的看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同苏联发生摩擦,直至公开冲突。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对南共联盟大加挞伐。

在重压面前,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没有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走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决心。从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人在反复探索 and 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1958年,南共联盟的纲领总结了这种“南斯拉夫模式”的本质特征。这个纲领主张多元论、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原则以及直接民主制和个人自由。

显然,这种社会主义模式需要有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南斯拉夫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

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把人道主义确立为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在他们看来,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生生的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实行工人自治,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的基本思想。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哲学家,返回到青年马克思的立场上去,并逐步形成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南斯拉夫实践派”。这一流派在随后的许多年中雄霸南斯拉夫的理论界,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节 “实践派”的兴衰

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情况一样,在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同各个时期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运动的形势密切相关的。19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南斯拉夫地区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传入这一地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南斯拉夫地区的各社会民主党大都接受第二国际理论家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随着第三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确立,苏联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94 页。

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并形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独立发展阶段。而体现这种独立发展的主要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实践派”经历了产生、兴盛和衰落时期。

1. 1945年—1950年代末,“实践派”形成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南斯拉夫在战后最初几年的恢复阶段中,理论领域也颇有起色。培养理论人才的机构逐步建立起来,理论刊物陆续创办,一批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

在这期间,以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杜尚·涅节里科维奇和萨格勒布大学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为核心,聚集着一批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和学生,形成了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个哲学中心。1953年在卢迪·苏佩克倡议下创刊的《观点》杂志和1957年创办的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机关刊物《哲学》为当时的哲学理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阵地。

50年代是一个批判“斯大林主义”和重新探讨马克思的本质的时期。由于同苏联关系的破裂,南斯拉夫思想家纷纷投身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洪流中去。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在这场斗争中成为中坚力量,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派”,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实践派”的核心力量。

5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50—1953年间,在这次批判高潮中,南斯拉夫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正统的思想。理论家们寻找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理论根据，批判“情报局的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解释。

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理论界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但分歧也已初露端倪。一些青年哲学家不满于停留在正统的立场上，开始显露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1953年，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出版后，更是引起人们对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浓厚兴趣。而由卢·苏佩克主持的《观点》杂志则率先提出了从人道主义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化的的问题。此外，一些思想家反对对西方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主张对它们采取分析的态度，进行自由交往。

1958年，当社会主义阵营对南斯拉夫的理论讨伐加剧时，南斯拉夫理论界再度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在这次批判高潮中，一些哲学家仍旧停留在辩证唯物主义正统立场上，而以加·彼得洛维奇、米·马尔科维奇和普·弗兰尼茨基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哲学家则完全抛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把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否定形式或异化形式，其要害是根本否认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地位，从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

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南斯拉夫哲学家们也从正面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哲学的本质、哲学家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异化、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形成人道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彼得洛维奇后来把这一段经历称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版本……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中包含的哲学的原来形式。而这条‘后退’的道路——从漫画返回到原型的道路,事实上是一种前进:从僵死的思想前进到活生生的思想。对斯大林哲学思想的批判,并不是放弃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复活和新生。”^①这种“复活”和“新生”在米·马尔科维奇看来也就是“打开了通往揭示一种深刻的、复杂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的道路”。^②“实践派”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派”是一种教条主义和本质上保守的思想倾向,“它至多只能促使现有科学知识的普及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时代意识,以便把实际的社会力量引向使这个世界得到解放并实现人道化的方向。从这个观点看,哲学的根本任务则是:为全世界的彻底解放创造人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不仅意味着整个南斯拉夫哲学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分野,而且也意味着南斯拉夫内部“实践派”基本成熟并同“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分野。

2. 1960—1974 年,黄金时期

1960 年在布莱德举行的关于“主体与客体、实践与反映论”的学术讨论会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次讨论会上,“实践派”同“辩证唯物主义派”第一次公开交锋。以安·斯托伊

① 加·彼得洛维奇:《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228 页。

② 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

科维奇、杜·涅节里科维奇、波·舍希奇等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派”，坚持“反映论”的基本观点；而以加·彼得洛维奇、米·马尔科维奇、卢·苏佩克、米·坎格尔加、丹·格尔里奇、布·波什尼雅克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则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对“反映论”进行了全面攻击。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映论”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畴是“实践”，即人类的自由创造性活动范畴，它超越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认识主体和客体不是既定的，而是实践的产物。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把认识看做是人的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

这次讨论会以“实践派”占据上风而结束。此后，“辩证唯物主义派”在南斯拉夫哲学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而“实践派”则进入了最富有创造性的黄金时期。普兰尼茨基后来在回顾这场斗争时不无骄傲地说：“在哲学界中维护反映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传统观念的人已经是极少数，部分哲学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新问题、新观点和某些传统哲学问题。”^①

“实践派”理论家在确立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对一般哲学问题的探讨，而越来越表现出干预现实的愿望。在他们看来，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应只限于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应当揭示现有社会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这些局限性的历史可能性。据此，“实践派”理论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对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南斯拉夫本国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批判。这个标志着哲学政治化的新方向

① 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78年萨格勒布塞文版第3卷第295—296页。

首先体现在 1962 年召开的南斯拉夫哲学协会年会上和由“实践派”理论家们撰写的题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文集中。1964 年,该学派创办《实践》(PRAXIS)杂志(该杂志次年用英、德、法文出了国际版),由主编者之一的加·彼得洛维奇执笔的发刊词明确提出该杂志的同时也是“实践派”的纲领:

“我们这个杂志上的哲学,应该是革命的思想,应该是对现存一切的毫不容情的批判,应该是对真正的人的世界的人道主义展望,应该是鼓舞革命行动的力量。”^①

从这一纲领出发,“实践派”在 1963—1968 年间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进步、自由和民主的概念,对职业政治家和官僚主义的批判,对现存的自治形式局限性的分析,关于在由政治控制的社会中对市场经济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批判,社会主义新批判的性质。”^②

1963 年末起,“实践派”组建了一年一度的“科尔丘拉夏令学园”,这一活动超出了南斯拉夫的国界,成为沟通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桥梁。参加这一年会的,除了南斯拉夫“实践派”成员外,还有来自西方和东欧其他国家的一批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像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戈德曼、曼德尔、布洛赫、博托莫尔、吕贝尔、科拉科夫斯基、赫勒尔、科西克、比林鲍姆等都先后参加过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活动。关于这一活动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我们可以

① 南斯拉夫《实践》杂志 1965 年第 1 期,《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327 页。

② 米·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

引用几位与会者的话来说明。马尔科维奇认为,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在社会批判的发展中曾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弗洛姆说,在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刚刚开始活动时,他就已经预见到这个“学园”在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事件;这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举行的一种开放性的会议,是在国际范围内交流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

由于“实践派”越来越倾向于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因而它与官方的齟齬也就不可避免。在50年代,由于该派成员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与政界的总政策是相吻合的,因而没有招来什么非议。但在60年代,“实践派”的观点引起了官方的不安,后者把“实践派”的倾向认做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1963—1968年间,官方曾动员忠诚于党的理论家对“实践派”进行反批判,但似乎成效不大。

1968年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等地发生的大学生事件成为当局反击“实践派”的一个契机。官方指责“实践派”对现制度的批判是群众闹事的根源,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实践派”成员活动的措施,甚至要求把那些毒害青年学生的最坏的哲学家开除出大学。在这以后,“实践派”活动的势头虽有所减弱,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实践》杂志继续发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照常进行,“实践派”哲学家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出版。马尔科维奇后来谈到,“实践派”之所以能够继续活动和继续出版他们的刊物,并在一定意义上继续在南斯拉夫的哲学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民主化在南斯拉夫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实践派”有充裕的时间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和政治声誉;“实践派”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实践派”内部及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一致;等等。

1970年代以来,包括铁托在内的南共联盟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连续不断地批评“实践派”,为此“实践派”哲学家不得不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种种辩解,例如,他们解释说,“批判”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要揭示现存事物的局限性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揭示现阶段自治实践中的某些矛盾,强调国家和政党消亡思想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重要性,只是指出社会发展趋势,而并非要在一日之内达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实践派”仍未能与官方达成谅解。1974年,《实践》杂志被停刊,一年一度的“科尔丘拉夏令学园”被停办。1975年,米·马尔科维奇等八名“实践派”成员被开除出贝尔格莱德大学,从此结束了“实践派”最活跃的黄金时期。

3. 1975年以后

《实践》杂志被勒令停刊和“贝尔格莱德八君子”被除名,也就意味着“实践派”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解体。此后,“实践派”成员虽多次试图使《实践》复刊,但均未能成功。而且“实践派”是由众多人员组成的松散的流派,成员间的观点本来就不完全一致,到了这个时候,分化也就更加明显了。特别是在1975年挫折中,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地遭受不同的命运:贝尔格莱德“实践派”骨干大多被开除出贝尔格莱德大学,而萨格勒布“实践派”成员依旧是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的中坚力量,这就不能不影响他们对进一步发展实践哲学采取不同的态度和途径。

围绕着1981年在牛津创办《实践—国际》杂志问题,“实践派”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米·马尔科维奇、卢·苏佩克等人积极参加编辑部工作,他们认为应当“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

内继承南斯拉夫《实践》的精神和工作”。而加·彼得洛维奇、坎格尔加等人则认为在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实践》杂志的积极合作者相继去世的情况下，难以保持原《实践》杂志的理论水平和战斗精神，因而拒绝参加新杂志的工作。

尽管“实践派”内部分化，理论活动及影响大大减弱，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南斯拉夫理论界最重要的力量。“实践派”成员仍一如既往地继续他们的理论活动。除了创办《实践—国际》杂志外，上世纪70年代末，萨格勒布几名核心人物与萨格勒布一个出版社合作，组织一批著名哲学家编写哲学分科的百科全书。在这套丛书的七名编委中，有六名是“实践派”核心人物、原《实践》杂志编辑部成员，全书作者也多是“实践派”哲学家。此外，“实践派”成员还活跃于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去国外讲学等。

“实践派”理论家也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们的实践哲学立场，例如，弗兰尼茨基在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第四版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50—70年代南斯拉夫哲学界争论的看法，同1961年初版中的观点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

8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新一代的哲学家崛起。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人继承“实践派”的人道主义传统外，大部分人则转向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思维科学的研究。1985—1987年间，围绕着贝尔格莱德地区分析哲学思潮的兴起发生了一次哲学争论。一些政界理论家和日沃基奇、科拉西等“实践派”理论家担心这一思潮会破坏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传统；而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另一些“实践派”理论家和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则反对政界对哲学研究的干预，主张